

一部小說的批評史 ——論姜貴《旋風》及其評論的三次變遷

應鳳凰ⁱ

摘要

長篇小說《旋風》完成於 1952 年，各版台灣文學史書都將它列為「反共文學」代表作。著名海外學者夏志清且推崇姜貴是「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更認定《旋風》是一部「能夠發人深省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專書」，指出它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占有重要地位。戰後以來，台灣評論環境與文學思潮不斷變化起伏，《旋風》從最早受到台灣文壇一片讚好，海外學者列入現代小說史作專章討論，到 1980 年代末，兩岸開放後大陸學者以意識形態相異而大加撻伐——上述三種評論現象分別出現在不同年代，以時間縱軸加以貫串，即形成戰後「旋風研究」的三個不同階段。同樣一部小說，由於它的特殊「反共體質」，隨著文學環境與思潮變遷，而形成六十年來一部曲折的「旋風接受史」。本文分三個階段探討其變遷的過程及其詳細內容。

關鍵詞：姜貴、旋風、反共小說、五〇年代台灣文學、小說批評史

ⁱ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Jiang-Kui's *Whirlwind* And Its Accepted History

Ying, Feng-Huang

Abstract

Completed in 1952, Jiang-Kui's "Whirlwind" was considered a masterpiece of the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by most historians of Taiwan literature. Hsia Chih-ting, a well-known overseas scholar and critic, regarded Jiang-Kui, as "a synthesizer of late-Qing and May-forth literary tradition", and his novel "Whirlwind" represents the culmination of realistic, satiric tradition of Chinese novel. In the post-war Taiwan, the literary trend was changing continuously, and praises and criticisms on "Whirlwind" appeared along with different situations in literary circles. As a literally work, "Whirlwind" was praised by writers in Taiwan during the 1950's. In the 1960's, Hsia Chih-ting spent an exclusive chapter to discuss "Whirlwind" in his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In the 1980's, scholars from Mainland China, with their communist consciousness, gave "Whirlwind" harsh comments because of their communist ideology. Due to the distinct "anti-communist character" of "Whirlwind", this novel had received different reviews through different environments and trends, making a "whirlwind accepted hist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se three stages chronologically and proposes a history of reading "Whirlwind" in the post-war period.

Keywords : Jiang-Kui , Whirlwind , Taiwanese Literature in 1950s, Anti-Communist Literature

討論「姜貴小說研究」發展與變遷，不能不從作者身分背景說起。做為一個小說家，姜貴（1908-1980）富於傳奇性的身世與人生際遇，形成其文學作品的特殊風格。他出身山東諸城縣一王姓大家族，自小在地主家庭裡成長受教育。青少年叛逆期，他嚮往「革命」，為「愛情」離家出走，是以中學生時代便加入成為國民黨員。以後投身軍旅，成了職業軍人。此時期正逢中國最動亂的年代，從而北伐、抗戰、剿匪等大小戰役，皆有機會目睹經歷。

戰爭結束後退役居住上海，結婚生子，轉業銀行。沒想到再逢國共內戰，舉家隨國民政府到了台灣。更沒想到來台後經商失敗，失業在家，偶然提筆試寫小說，竟開啓往後與筆墨稿紙為伍的寫作生涯。「為度小月，欲罷不能」，在台灣 30 年間竟身不由主地，當了半輩子職業作家。

一、姜貴研究三大特色

姜貴一生發表作品無數，單小說一類，已出版超過 20 部，卻曾發表文章公開表示，他真正的作品「只有兩部半」——《旋風》、《重陽》，以及未能妥善修改的《碧海青天夜夜心》勉強算是「半部」，其餘都是為換取生活所需而寫，沒有多少文學價值。主客觀因素加在一起，形成「姜貴研究」第一個特色：多年來各方評論都集中在極少數幾本作品上，若照比例來算，甚至可嚴格地說，單集中在《旋風》一部小說上。

《旋風》一書誕生過程相當坎坷，差點「難產」而胎死腹中。它被讀者「接受」與閱讀的情況也頗具傳奇性。這部小說後來雖被學者讚譽為「反共文學經典」，弔詭的是，它卻在政府大聲鼓吹「反共文學」的 1950 年代，到處碰壁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旋風》於 1952 年脫稿，曾投寄給二十餘家報刊與出版社，卻像顆皮球般被踢來踢去，最後繞回原地，作者不得已只能將它束之高閣。直到 1957 年，既捨不得毀棄原稿，又不忍心血結晶久不見天

日，百般無奈之下自掏腰包，印出 500 冊給自己留個紀念，並分贈各機關與文友，包括圖書館、國內外學者作家等。於是有了一連串回響與回應，如胡適與蔣夢麟的回信，作家的書介與書評，以及一系列從胡適到夏志清等海外學者的高度肯定。

由此而產生「姜貴研究」第二個特點——海外研究者的讚譽或支持凝結成一股力量，影響海內文壇，形成類似「出口轉內銷」的特殊傳播模式。小說《旋風》的經典化與國際化，得力於夏志清教授將之寫入英文版《中國現代小說史》，此書 1961 年由耶魯大學出版。由於夏教授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而此書數十年來一直是美國各大學東亞系的教科書，也促成美國研究生羅體模以「姜貴小說」做為博士論文——台灣當代小說家成為美國大學「博士論文」題目的，以時間論，姜貴應是第一人。

其次是胡適博士在美國收到姜貴贈書後，很快回給作者一封讚美的信。1959 年《旋風》終於有了上市的機會，由台北「明華書局」出版印行。明華版扉頁，便以胡適寄自紐約的手稿原信「製版」用做小說「代序」，等同為這本小說加持與背書。在政治氣氛蕭瑟緊張的白色年代，文化出版業無不繃緊神經，海外學者的重要性與影響力從《旋風》出版個案看得一清二楚。

《旋風》做為一本書的生命史，中間有一段歲月「銷聲匿跡」將近三十年。明華書局因經營不善於 1961 年停業，作者另與高雄「百成書店」簽約，而有了 1966 年的長城版。長城版亦因不明原因，只出一、兩版便不再續印。自此以後，除了少數地下盜印本，往後 30 年間，《旋風》便在台灣書市消失了蹤影，退出江湖，只剩名字流傳於文學圈，一般讀者買不到也看不到此書。一直要到 1990 年代末期，經出版人蔡文甫多方努力，《旋風》才終於在 1999 年由九歌出版社重排再版，重現江湖，再度流通於書市。

一般而言，評論與研究的情況會隨著文學環境的變遷而起伏。此書再版

的契機，很大程度來自於它再度受到學界與文學史書的矚目。1987 年台灣解嚴前後，兩岸日漸三通，兩邊文壇這時爭相開始「台灣文學史」書寫與出版——由於戰後 1950 年代常被文學史設定為「反共懷鄉」文學時期，姜貴《旋風》又是反共小說名著，各版史書再三提起這部作品。值得注意的是，海峽兩岸意識形態不同，左右觀念有異，評價不免兩極。以大陸學者的角度而言，你既「反我的共」，可以想見不會有多好的評語。這是 1980-1990 年代之間的研究情況，形成姜貴研究第三個特色——政治意識形態左右了文學批評的準則。上述三個特色分別出現在不同年代，若以時間的縱軸來貫串，正好形成戰後「姜貴研究」的三個階段，或說研究的三波浪潮。

二、縱軸：《旋風》研究的三波浪潮

《旋風》初稿完成於 1952 年，四處被退之後，自印 500 本取名《今檣杙傳》，於 1957 年成書。初版分贈朋友與相關單位，只送不賣，並未真正公開發行。1959 年經文友介紹，交台北「明華書局」印行上市，恢復書名《旋風》，這才與一般讀者大眾正式見了面。從「自印本」到上市版本，書名雖不同，但兩個版本時間距離很近，結合成「《旋風》初亮相」的「評論第一期」。

此書儘管誕生不易，然而不出版則已，一成書即刻獲得文壇熱烈迴響。小說家、評論家都給予高度讚譽。不僅台灣一地，更有來自海外的充分肯定。這是作者當初不得已自費印書的時候，無論如何想不到的事。姜貴於是將發表於各報刊的 18 篇評論完整收集起來，加上書序，題為「《旋風》評論集」，另取書名：《懷袖書》，於 1960 年 9 月再次自費出版，與《今》書同樣掛名「春雨樓」，同樣只印 500 本。這個當初也許不是周詳計畫的出版動作，卻為以後文學研究者，體貼地留下了「《旋風》批評史」最早的第一手資料。

(一) 1950年代——「《旋風》熱」盡在《懷袖書》

雖然難有具體數據做科學論證，但以台灣 1950 年代物質匱乏的環境來推斷，《懷袖書》是戰後「第一本」單部小說「評論合集」的可能性很高。果真如此，那麼《旋風》便是台灣最早擁有一部「評論專書」的長篇小說。

《懷袖書》於 1960 年秋天出版，所收文章皆發表於 1958 及 1959 兩年。毫無疑問，因姜貴自印《今》書遲至 1957 年方出版，因而書中所收的文章，就時間而言非常貼近評論對象，是《旋風》批評史「第一章」，也是台灣文學場域回應此書的首部曲。

此書不只在內容上呈現當時文人作家的評論觀點，書本身的編排方式，也透露著當時文學生態與時代氛圍。由於《今》書原稿有被「各方拒絕」的出版經歷（原因不明），於是作者贈送的 200 本裡，好些是送到國民黨文宣機構，如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救國團總部等，姜貴編輯「《旋風》評論集」時，將這些機構的感謝信或制式推薦函，全刊在《懷袖書》最前面。

接在「機關推薦信」之後，刊登「名家回函」，首先刊出蔣夢麟回信全文。蔣夢麟對《旋風》有句經典評語：說它是一部「新《水滸傳》」，回信日期：1959 年 10 月 12 日。這說明內行人閱讀《旋風》，很快能發現作者與中國古典小說的深厚關係。信函另一重點，認為這是小說同時也是歷史紀錄：

本書以小說體裁寫北伐與抗戰期間前後土共發展的歷史，其中移植穿插，多本於事實，故可作土共發展實錄看，亦可作共黨搶奪政權歷史看。¹

蔣夢麟曾任北大校長、教育部長，來台之初擔任「農復會」主任委員，他賞析文學作品自不外行。而認定《旋風》為「歷史實錄」的研究面向，持

¹ 見《懷袖書》，頁 18-19。題目：蔣夢麟先生致作者函，寫信日期：1959 年 10 月 12 日。

續數十年從未間斷，後面還會再討論。

《懷袖書》正文收入各報刊發表的書評 18 篇，作者群包括：王集叢、方以直（王鼎鈞）、阮日宣、劉心皇、趙雅博、程光蘊等。他們不是專欄作家、刊物主編，便是評論或小說作家——合為「一本評論集」的共同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1950 年代後半期台灣文壇的評論風氣與評判標準。好些文章對「小說美學」與「反共文學」的關係多所論述。

有個觀點是共通的，直到「《旋風》出現」，他們才終於在台灣文壇看到一本藝術性高的「反共小說」。由此可見在政府文藝政策下，大家對於「好作品」誕生有熱切的期待。書中前四篇是針對自印版的評論，首篇孫旗的文章，即以〈一部未發行的文獻性小說《今禱杙傳》〉為題，1958 年 4 月刊登於香港《自由人》週刊，顯見贈出的書各地都有知音。而「文獻性小說」的意見，與蔣夢麟的「歷史實錄」觀念略同。

全書 18 篇中，最引人注意的，應屬作者本身也是小說家高陽所寫的：〈關於《旋風》的研究〉一文。此文長達 28000 字，創下《旋風》單篇評論「篇幅最長」的歷史紀錄。原刊載於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第 6 卷第 6 期。這篇文章多年後仍不斷被引用，可說是姜貴研究第一波浪潮裡最亮眼，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篇評論。

高陽此文有幾個論點：其一，讚揚《旋風》是部「大書」，能反映動亂的大時代。其二，指出小說主題是：「中國共產黨何以會得勢？」。其三，不憚其煩，鉅細靡遺地提出小說人物及修辭技巧如何高超奧妙；更重要的，指出小說故事「必有所本」，小說作者必是主角人物中「方」氏家族中一成員。就像《紅樓夢》中的賈寶玉是作者曹雪芹自己，《旋風》的人物裡必有姜貴自己的影子。

在後來一篇文章中，高陽提到何以他會寫出這篇長文——除了被小說主

角（或姜貴）的看法打動，也受到這部小說技法大大的啓發。他認為：姜貴「小說技巧，鎔舊入新，別成一格」，對於「人物的選擇和刻畫，真是有獨到之處」。關於小說技巧的研究，他認為《旋風》「是一個很特殊的標本，值得下一番功夫去研究」²。

由於高陽本身是經驗豐富的小說家，評論又刊登於學院教授創辦的嚴肅文藝刊物上，發表與刊登的現象本身，足以穩固《旋風》在台灣文壇裡無可撼動的重要地位。而高陽提出「《旋風》人物皆有所本」的觀點，也開啓往後將小說人物「還原」或「對號入座」的「《旋風》人物索引派」研究方式。

（二）1960年代：《旋風》從海外到海內

1957年10月成書的《今禱杙傳》寄出不久，姜貴於同年底收到胡適寄自紐約的回信。這封信被出版人以原跡製版，做為明華書局版《旋風》〈代序〉。一般讀者翻開書，若習慣先讀序言再看小說的話，會先分享胡適博士的閱讀經驗：

五百多頁的一本書，我一口氣就讀完了，可見你的白話文真夠流利痛快，讀下去毫不費勁，佩服！

差不多同一時間收到書的，還有在美國的夏志清教授。就一部小說的經典化與國際化而言，夏志清收到書之後發揮的效應，比胡適博士要大得多。夏教授當時在紐約州立大學教書，正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贊助，以英文進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撰寫工程。《今禱杙傳》來得正是時候，夏教授在書中附錄專章，論姜貴的小說。姜貴名字不僅進入小說史，且占有一整個章節。根據陳森的翻譯，夏志清給這部小說的春秋之筆是這樣的：

² 高陽，〈《旋風》·姜貴·我〉《幼獅文藝》第13卷第1期（1960.7）。

姜貴的《旋風》是現代中國小說中最偉大的作品之一，……卓然成為一部共產主義的崛起的扣人心弦的紀錄，熟練地但却毫不客氣地訴述五四時代以迄中日戰爭初期的中國人的生活的複雜背景——連同它的腐化與可怖。³

夏教授認為《旋風》做為「中國共產主義的一種深入的研究資料」，除了堪與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相並列之外，他身為學者與小說史家，進一步將姜貴納入中國小說傳統，認為這部小說「同時還代表著中國的諷刺傳統」——是自古典的小說家以迄老舍、錢鍾書的「最近的開花」。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⁴1961年由耶魯大學出版以後，在美國漢學界是一部開山之作，數十年間一直被各大學東亞系選作教科書。其融合中西文學理論，以寬廣的批評視野，探討中國現代小說發展方向，尤為後人稱道的，是他致力於「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的獨到眼光，言人所不敢言，如張愛玲、沈從文等，便因為小說史的推崇，更奠定了他們作品的經典地位。

除了《旋風》，夏教授也細細解讀姜貴另一部長篇小說《重陽》。此文副標題：「兼論中國近代小說之傳統」，在台北《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連載三天，除了重申姜貴是「晚清、五四、1930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也聲稱姜貴小說「正視現實的醜惡面和悲慘面，兼顧『諷刺』和『同情』而不落入『濫情主義』的俗套」，再以《重陽》主題和小說人物為例，大段引用小說情節與人物對白，目的是：「希望引起讀者閱讀此書的興趣」。相信夏教授的呼籲與提醒，對於後來姜貴獲得「第一屆吳三連文藝獎」多少有些影響。

除了使姜貴作品列入《中國現代小說史》一節專論，夏志清教授另一個

³ 夏志清著；陳森譯，〈論姜貴的《旋風》〉，原載台北《中華日報》副刊（1964.12.25）後收入《無違集》（台北：幼獅文藝社，1974.8），頁253-259。

⁴ 《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最早只有英文版。將近二十年後，才有集合劉紹銘、夏濟安、李歐梵、水晶等眾多港台學者之力翻譯的繁體字版，分別於1979年和1985年在香港和台灣出版。2001年在香港出了繁體字增訂版，直到四十多年後的2005年才有復旦大學印行的簡體字中譯本。

影響，是促使美國學生 Timothy A. Ross（中文名：羅體模），以姜貴為題材撰寫博士論文。羅體模 1960 年代專程來台蒐集資料、訪問姜貴，1972 年以姜貴研究為題獲得博士學位。不僅如此，他還是《旋風》的英譯者，更應美國杜尼（Twayne）出版社之邀，完成 Chiang Kuei 一書。本書收入羅體模的論文：〈論姜貴小說的主題〉，便是 1974 年他參加波士頓「亞洲年會」發表的論文，也是他部分博士論文的縮寫版。他認為姜貴小說主題有三：一是反映中國傳統社會的實在情形，二是描寫醉心共產革命者的狂熱虔誠，其三，分析這些革命者的得失和希望。

很少人注意到，在台灣當代小說家裡，做為「博士論文題目」的，姜貴或許是第一人。那時台灣的中文系還沒有「當代文學」的概念，所以撰寫者只能是美國人。40 年後回顧這股「姜貴研究旋風」，似乎是海外強過海內，然後吹向海內。以反共小說做為研究主題，到了 1960、1970 年代流行現代主義的台灣，按說已保守過時。然而靠西風一吹，像是「出口轉內銷」，難怪 1974 年姜貴在「幼獅文藝社」出版的一本傳記小說《無違集》裡，書後將胡適、夏志清、羅體模等人討論姜貴小說的文章，一口氣列了五篇做為書的「附錄」。

接下夏志清教授「現代小說研究」棒子的，是同樣任教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王德威教授。1999 年春由台北《聯合報》副刊策劃主辦一場備受文壇注意（也引起爭議）的 30 部「台灣文學經典」選拔，並接著召開「第一屆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王德威教授是七個選拔委員之一，又是研討會上〈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論姜貴《旋風》〉一文的發表者。這篇一萬多字的論文，成為姜貴研究史上，繼夏志清之後最具指標性的一篇，除了對《旋風》藝術手法的高明處進一步指認，更把姜貴作品特殊性，放在開放後兩岸更大的歷史背景加以審視。

1950年代台灣反共文學主潮常被譏為「反共八股」，王德威的看法是：

我以為姜貴就是一位最不八股的反共作家。更重要的，他的小說始於對共黨禍國的檢討，卻終能超出眼前的血淚控訴，轉而對近代中國歷史的嬗變，做出沉鬱的省思。⁵

在那個年代的表述傳統裡，小說家或喧囂吶喊，或涕淚飄零，他認為唯有姜貴那「語言素樸，情節不刻意修飾」，尤其他的「冷冽觀照」可說是個異數。他也將其風格置於中國文學傳統，認為「姜貴將他的故事沉浸在荒謬怪誕的敘述中」，是晚清譴責小說「自覺的繼承者」。

在眾多評論家裡，王德威文采好且能見人所未見；例如他認為姜貴在反共小說的另一大突破，「在於將政治情欲化，情欲政治化的看法」。小說角色的「性壓抑及放縱，讀來令人怵目驚心。」這一見解是過去評論裡從未出現過的。除了再次提到姜貴小說「有所本」：「不是過來人寫不出這樣躊躇沉鬱的小說」，更進一步論斷：

姜貴何只反共而已，藉《旋風》這樣的作品，他是在反思五四以來中國追求現代化的希望與虛惘。⁶

海外學者張誦聖則運用文學場域理論，談到《旋風》的「舊小說形貌」如何影響它在讀書市場的接受度，藉此為當時台灣文學生態做了精闢的分析。小說自費出版之後又倍受海外名人肯定，「但是即使正式出版後也沒有在1950年代末的台灣市場上造成轟動」，張教授看到此一現象的多面性：

《旋風》的舊小說形象和它的陰晦氛圍、道德敗壞的諸多角色，和國家宣傳文學對意識形態純正的要求，以及與之相應的文壇品味，顯然有扞格不入之處。因此，除了狹義的政治之外，這個現象也反映了文類與市

⁵ 王德威，〈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論姜貴《旋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6），頁23-34。

⁶ 同前註。

場，經典與通俗，現代與傳統等等複雜棘手的議題。⁷

原來小說主題與內容，與當時「台灣主導文化」格格不入。張誦聖不只注意到《旋風》經典化過程坎坷因素，也通過小說「外緣研究」，包括此書生產及消費現象，探討其「文化位階」與「文類特質」，讓《旋風》做為一部「反共小說」竟而在台灣「備受冷落」的原因，有了深一層的詮釋。

（三）1980年代：兩岸「台灣文學史」裡的《旋風》

台灣解嚴前後，即上世紀1980年代末期，兩岸爭相書寫台灣文學史。事實上，中國大陸比台灣更早完成「有史以來第一部台灣文學史」。由於各版「台灣文學史」，多把1950年代設定為「反共懷鄉」文學時期，也多認定姜貴的《旋風》是反共文學時期重要代表作，因而它不斷被提起、被詮釋。雖然《旋風》這時在書市已斷版多時，幾乎被台灣讀者大眾所遺忘。

有意思的是，兩岸史家對於這部小說的評價相當兩極，可說南轅北轍。海峽兩岸不僅分隔多時，兩邊政治意識形態此時亦呈敵對狀態。統獨觀念不同，如何評價《旋風》主題與內容，正是雙方文學觀正反差異的最佳展示。

葉石濤在1987年出版了台灣人撰寫的第一部文學史：《台灣文學史綱》，書中如此評論姜貴小說：

《旋風》的所以在眾多反共小說中脫穎而出，並不只是靠描寫土共的生長和衰亡過程的刻劃入微，而是他著力描寫傳統封建制度的腐敗和墮落。⁸

葉石濤認定：「姜貴的反共理念基礎頗薄弱」，又說他的小說除了具有濃厚傳統白話小說「勸善懲惡思想」，從某方面說，也頗有「才子佳人」小說

⁷ 張誦聖，〈台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6），頁124-127。

⁸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2），頁93。

的味道。他的詮釋，與夏志清教授認定《旋風》是「共產主義深入的研究資料」的看法出入很大。

不像台灣的史家，除了主題，也討論作品的藝術性，大陸的文學史書寫，談到「反共小說」很難不以「意識形態」做為評論標準，對於姜貴小說的評語是「扭曲事實」、「汙蔑」、「任意編造」。以和葉著同年出版，由遼寧大學印行的《現代台灣文學史》⁹為例，書中對小說藝術面隻字不提，聲稱姜貴能得到夏志清等人「吹捧」只因他鮮明的反共傾向，而這部小說：

對歷史、時代、社會生活做了全面的歪曲描寫和解釋，表現出姜貴先生對共產主義的無知和對共產黨的偏見。

比這本還早一年出版的《台灣新文學概觀》，用詞也很直接：「《旋風》的主題反共，材料虛假，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革命的勝利汙蔑成『終必像旋風般的煙散失敗』」¹⁰。

古繼堂 1989 年出版的《台灣小說發展史》是兩岸最早一部小說史，且以簡、繁體兩種版本分別在兩地出版印行。

要想自己的作品成為不朽，就必得真誠地反映歷史。哪怕你對那樣的歷史並不喜歡，也不能任意去編造，否則即使你的文字再華麗，也很難不朽。¹¹

看得出來，以兩岸文學史書裡的「姜貴小說」研究與評論，不免處於「意識形態掛帥」的批評狀態。從台灣學者的角度看，大陸來台作家如姜貴等人寫的反共小說，無不是有血有淚的親身經歷，例如齊邦媛教授便認為：「反共懷鄉文學是傷痕文學的序曲」¹²，但從大陸學者角度來看，卻認為這

⁹ 白少帆等著，《現代台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12），頁 262。

¹⁰ 黃重添等著，《台灣新文學概觀》（上冊）（福建：鷺江出版社，1986.7），頁 65。

¹¹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1989 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先有簡體字版，同年 7 月由台北文哲出版社印行繁體版，本文引用根據繁體版，頁 161。

¹² 齊邦媛，《千年之淚》（台北：爾雅出版社），頁 29。

些小說是無中生有，是歪曲事實的偏見。從戰後 1950 年代到新世紀，關於姜貴小說的評論與研究，果然隨著文學環境的變遷而有很大的起伏。

三、姜貴小說另類研究面向

姜貴小說《旋風》研究裡，有一個特殊面向是其他長篇小說所沒有的，便是從誕生的 1950 年代末，一直到新世紀的今天，總有學者或讀者認為「《旋風》人物皆有所本」。從最早的胡適、蔣夢麟，小說家高陽、專欄作家王鼎鈞（山東人），到最近任教山東大學，也是姜貴（王氏）家族後輩的王瑞華教授，都認真「對號入座」，既認定作者寫的是自家故事，小說裡的人物便可逐一追溯其「原型」，因而形成如「《紅樓夢》的賈寶玉即是作者曹雪芹本人」式的「索引派研究」。各家汲汲將小說人物「還原」，「《旋風》人物索引派」這一研究面向遂不絕如縷。本書收入方以直（王鼎鈞）的〈《旋風》人物考〉，以及姜貴親族晚輩王瑞華 2012 年發表的：〈分散百年的家族再聚首——當《旋風》終於颺回家……〉，都是這類例子。

早在 1959 年，高陽便在〈關於《旋風》的研究〉一文中指證歷歷：小說裡的「方通三」是「王統照」（引胡適的信），「張嘉」是「臧克家」。又說：「方鎮」或是假託的地名——「方姓隱射王姓，應無疑問」，而作者就是「方」氏家族的一員。

王鼎鈞接著高陽之後，同年在《徵信新聞》副刊發表的〈《旋風》人物考〉，進一步指出小說主角「方祥千」就是山東諸城相州鎮「王翔千」，姜貴本人姓王，也是相州人。由於王鼎鈞家鄉山東臨沂，距相州很近，「諸城王氏和臨沂王氏都是大族」，老一輩的人頗有往來，是以「《旋風》裡面幾個重要人物，我的父親都能指出原型」，當年小說主角「王翔千」和王鼎鈞的父親「都在濟南」。難怪王鼎鈞說：姜貴小說將家鄉人物「一一聚而寫之，教

山東老鄉看了，有說不出的親切」。也因為這層淵源，到了 1960 年代，兩人成了忘年之交，王鼎鈞當了副刊編輯之後，請他寫稿，又加了一層「編者與作者」的關係。

然而也就因為有像蔣夢麟、高陽、王鼎鈞這一脈相承的「索引派」讀法，認定《旋風》寫的是姜貴的家鄉與家族，小說「多本於事實，可作土共發展實錄看」（蔣夢麟語），此一「有所本」的觀念，其「續章」便是大陸文學史書寫裡，認定的「任意編造」、「扭曲事實」。評者與史家都忘記了「小說」原本是「虛構的世界」，姜貴本人即有過現身說法，他告訴讀者，小說裡的方祥千，絕對不是王翔千：

小說人物需要凸出，需要代表性。拿真實人物入小說，往往不夠要求。因此，只能取其特出的一點，予以加強。或就三個五個以至更多的真人，歸併剪裁，而成為一個代表人物。¹³

不僅如此，還進一步說明他的「故事如何構成」：真實的世界裡，個人的活動「只限於他們自己的小天地，他們之間並無故事性的聯繫」。而小說作者於選定其代表性人物之後，「還要設法將他們粘連在一起，這就是故事的構成」。

雖然作者把寫作過程，小說創作的必要方法寫得一清二楚，做為姜貴家族，或說，做為被描寫的對象，包括小說研究者，仍然不容易冷靜面對。此一脈絡的最新一例，是前文曾提到王瑞華教授於 2012 年 11 月發表於《文訊雜誌》的〈分散百年的家族再聚首——當《旋風》終於颺回家……〉。此文雖以《旋風》為核心，卻非小說評論，可說是一篇報導。作者是相州王家親族，碩士生時代研究港台文學。這篇文章詳實寫道，當她把《旋風》帶回家鄉，親族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竟有這麼一部小說時，無論是否先對照史實，

¹³ 姜貴，〈我怎樣寫《旋風》〉，收入《無違集》（台北：幼獅文藝社，1974.8），頁 211。

「這些老人們幾乎是普遍的義憤填膺」¹⁴。

姜貴家族發現、閱讀這部小說之後的反應各不相同。其中一位，「看到他那些情誼深厚的家人、族人被妖魔醜化得如此不堪，他氣得食不下嚥，睡難安眠」¹⁵。當然也有冷靜面對姜貴小說的親族後代，例如王翔千的孫子王肖辛讀完小說後，被徵詢意見時，他答道：「《旋風》與王家是有出入，但與整個大趨勢是吻合的」。這篇長文的結尾是，作者最後跨海來到台灣探望姜貴後代，王家後人因為這部小說，以及姜貴自傳的流傳，終於能互相見面認親：

分離近百年的家族終於因《旋風》的回歸而團圓，這是文學對文學家族最大的回報和恩賜。¹⁶

海峽兩岸近百年特殊歷史背景，讓一部小說，或說「反共小說」，出現如此「坎坷命運」——從誕生幾乎難產，到消失書市，直至50年之後遲遲「回鄉認親」，末尾竟還完成「促進家族團圓」的特殊使命。文學思潮隨著時代而變遷，同樣的，文學作品的研究與評論也隨著時間而不停變化著，《旋風》做了最好的例證。

¹⁴ 王瑞華，〈分散百年的家族再聚首——當《旋風》終於颺回家……〉，《文訊雜誌》第325期（2012.11），頁95。

¹⁵ 同前註。

¹⁶ 同前註，頁94。

參考文獻

專書

- 姜貴，《今禱杙傳》（台南：自印，1957.10）。
- 姜貴，《旋風》（台北：明華書局，1959.6）。
- 姜貴編，《懷袖書》（台南：自印，1960.9）。
- 夏志清原著，劉紹銘編譯，《中國現代小說史》（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9.9）。
- 黃重添等著，《臺灣新文學概觀》（上冊）（福建：鷺江出版社，1986.7）。
- 葉石濤，《臺灣文學史綱》（高雄：文學界雜誌社，1987.2）。
- 白少帆等著，《現代臺灣文學史》（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87.12）。
- 古繼堂，《臺灣小說發展史》，（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89.11）。
- 齊邦媛，《千年之淚》（臺北：爾雅出版社，1990.7）。

期刊

- 王德威，〈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論姜貴《旋風》〉《臺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9.6）。
- 張誦聖，〈臺灣女作家與當代主導文化〉《文學場域的變遷》（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6）。
- 姜貴，〈我怎樣寫《旋風》〉，《無違集》（臺北：幼獅文藝社，1974.8）。
- 王瑞華，〈分散百年的家族再聚首——當《旋風》終於颺回家……〉，《文訊雜誌》第325期，（2012.11），頁95。